

另類媒體與社群建構 – 《破報》與台灣都會次文化的實踐

陳子軒

世新大學新聞系

助理教授

seanchen@cc.shu.edu.tw

Tel:2236-8225#3150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17 巷 1 號

一、緒論—關於《破報》—台灣的《村聲》？

《破報》是隸屬於台灣立報社的一份非主流免費週報，1994 年以《立報》副刊《破週報》的形式問世，1995 年 9 月 3 日獨立出刊，其間曾經三個月停刊重整，1998 年 3 月復刊，並恢復成 32 版，以地理區域而言，儘管中南部也有定點提供《破報》，然而數量上比起台北卻是有極大的差距，因此稱《破報》為台北都會報並不為過。根據成露茜與丘德貞（2006: 176）的研究，《破報》歷年的封面故事以「社會/文化行動」、「藝術文化」、「音樂」和「電影」四大類為主，而且以批判性評論、顛覆主流為其特色，以發行人兼社長成露茜的發刊詞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破報》的定位：「『有破才有立，有立必有破』，前世代、現世代和孽世代的交替，在立和破的辯證的軌道上滑行…《立報》反應一個世代欲立還破的認知，它質疑所有威權，只為營造一個容納各種聲音的空間，去勾勒未來社會的想像。立報現在推出孕育一年多的破週報，它企圖刻意切斷與前世代意識上的瓜葛，不斷破除所有禁忌。」《破報》的副標 - 孽世代之聲 - 儘管「孽」一字是諧音 Voice of the Generation Next 中的「Next」而來，但是也畫龍點睛地點出該報的反抗色彩。

根據此發刊宣言與副標，不難發現《破報》在台灣媒體界的獨特性，而且挑戰主流的意味濃厚，不論其創立是否師法美國最具代表性的另類媒體《村聲》(The Village Voice)，兩者的走向與風格的確十分接近。《村聲》週報自從 1955 年於紐約格林威治村創刊以來，就以犀利的政治批判、社會運動報導、藝文活動訊息與音樂、電影、戲劇評論著稱，對於紐約大都會區次文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與 Jack Kerouac 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形成一股文壇新勢力有絕對密切的關連。另外，《村聲》對於非主流劇場也是貢獻良多，每年的「Obie 獎」就是在主流劇場「東尼獎」(Tony Award) 之外，對百老匯外 (off-Broadway) 戲劇的肯定。除此之外，自 1970 年代以來，《村聲》的樂評家 Robert Christgau 主筆的 Pazz & Jop 年度音樂報告集結數百名樂評家的票選，挑選出不同於一般流行樂榜單的年度報告，更是被視為對於流行樂壇一針見血的評論。另外，1999 年起，電影部分也仿照 Pazz & Jop 的型式，選出該年度的最佳電影。

經營權方面，《村聲》自 Norman Mailer, Ed Fancher 和 Dan Wolf 創立以來，保持獨立經營，然而自從 1974 年起，Rupert Murdoch 入主之後，《村聲》也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另類報紙；1996 年起，原本在報攤上販售的《村聲》，也在新的競爭者如《New York Press》出現的情況下，改採免費取閱的發行通道；2005 年，《村聲》被來自鳳凰城的「新時代媒體」(New Times Media) 集團買下，但沿用原來村聲之名，1990 年代末期以降的人事不安定更在此時一一爆發，音樂編輯、性專欄作家紛紛遭解職，於《村聲》執筆長達三十多年的招牌樂評 Robert Christgau 亦於 2006 年 8 月遭開除，2005 年以來更是已經更換過五位總編輯。《村聲》儘管在經營權易主後，仍維持一貫調查報導、人文關懷與政治批判的特色，但是 2006 年記者 Nick Sylvester 捏造醜聞，重創了《村聲》的聲名，加上前述的人事紛擾，

使得《村聲》的評價每況愈下。

《村聲》與《破報》兩者都屬於都會區的免費週報，然而，兩者的規模可說是大相逕庭，即便是號稱「另類媒體」，村聲媒體（Village Voice Media）在美國已經是一個包含十七家「另類週刊」的媒體集團，《村聲》儼然是另類媒體中的主流媒體，24 萬的發行情也比較許多主流媒體要大得多，相較之下，《破報》的另類色彩則更為濃厚，延續其母體《立報》獨立辦報的傳統，而且在世新大學的支持下，財務與編務皆穩定運作，總編輯黃孫權自《破報》發刊十多年以來，一直是掌舵者，也引領著《破報》走過墮胎、春吶、反反毒、樂生等重要另類議題。

二、文獻回顧

國內傳播界對於《破報》的研究，可說近乎付之闕如，就像《破報》在台灣媒體的另類，另類媒體的研究也屬傳播學術界的另類，直到成露茜與丘德貞（2006）的「逃逸主流、獨樹一格—台灣另類『破報』群像」一文，才算是第一篇針對《破報》學術性的專文，該文以《破報》的歷史、演變切入，加以報紙內容的論述分析，發現《破報》不但從主流媒體中逃逸出來，更具有挑戰、顛覆主流意見氣候的特性，進一步集結一個成形中的社群。本研究乃延續上文，希冀為台灣獨特的另類媒體《破報》，在社群建構與都會次文化的建立上的角色找到定位。

根據該文的統計，《破報》從副刊版、創刊版到復刊版，「社會/文化行動」的比例大幅下降，反觀另外三類卻穩定成長，副刊版一年期間，「社會/文化行動」主宰頭版，復刊版則變成平均涵蓋上述四大類，這明顯轉向的原因為何？此一面向的忽略，是否與成露茜為《破報》社長兼發行人、丘德貞為特約撰述的身份，因而無法保持與研究主體關鍵/批判的距離（critical distance）？Insider/Outsider 之間的拿捏，成為該研究不可逃避的質疑。

綜觀另類媒體的論述，就像它的研究主體一樣，也是一種「另類」的論述，相關研究的數量並不多，台灣如此，歐美媒體學術社群亦如此，然而就像 Atton（2002）所質疑的，在現有的傳播理論架構下，其實已經具有許多可供另類媒體研究參考，相關研究也該遠比現成的更多才對，就以法蘭克福學派來說，Adorno 認為大眾媒體的不斷退讓與妥協，使得唯有另類媒體的存在，方才能成為一股抵抗的力量。另類媒體的討論在近幾年已逐漸獲得傳播學界的重視，Silverstone（1999:103）認為，另類媒體「創造另類聲音的新空間，而提供特定社群的利益和參照與顛覆的焦點」，這類媒體鼓勵無法近用主流媒體的閱聽人，透過它們得到所需的訊息，因此所使用的語彙與主流媒體有明顯的區隔。

另類媒體與次文化的構連，英文文獻已具有一定的數量，其中尤以迷誌 (fanzine, 或譯作同仁誌) 與龐克文化的建立為大宗（見 (Hebdige, 1979; Rutherford, 1992; Savage, 1991; Triggs, 1995)），這類另類媒體都有個很重要的特色，那就是鼓勵讀者的參與，這也正是另類媒體的消費者得以以「社群」稱之的主要原因，這

些消費者不僅是單純的受眾，更積極發聲，成為媒體內容的一部份，成露茜與丘德貞（2006）的《破報》研究中亦呼應了此特性。Enzensgerber & Roloff（1974）更直指，另類媒體具有動員（mobilization）的能力，是當今民主實踐極顯著的特徵，而現今媒體如果要具備政治解放的能力，必須具備（1）觀眾與創作者間的互動性、（2）群體製作，以及（3）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與人類的平凡需求（Enzensberger, 1976）。

1.迷誌、免費報、另類報

在進一步分析另類媒體的功能之前，必須要對不同類別的另類媒體做個簡單區別。首先在迷誌部分，一般所謂的「迷誌」具有自主編輯、財務自籌和自主發行等特色（Zobel, 1999），而且該媒體是與特定社群所共同關注的主題息息相關的，像是某本（位）漫畫（家）、某個樂團（派）、某部電視影集等等，而迷誌由其社群成員共同參與和近用的特色，也使得它們屬於文化製作者，而非消費者（Fiske, 1991），在製作過程中，迷誌的參與者傾向將自身經驗投射入他們創作的文本中，因此迷誌社群中，其實是對自我的揭露與認同展現，而非對他者（藝人、文化產品等）的疏離經驗，透過群體參與和對話的迷誌，社群性就此建立起來（Atton, 2002）。

Dick Hebdige（1979）針對英國龐克文化的研究發現，龐克迷誌的特色就如同它所鼓吹的音樂和生活方式一樣，是業餘、地下、無政府、強調破壞既存章法與秩序的，而龐克迷誌在這社群當中，扮演著傳遞該次文化訊息的功能，也就是說，沒有了龐克迷誌、龐克文化幾乎就不存在了。與 Hebdige 相同，Janice Radway（1999, quoted in Atton, 2002）同樣把焦點放在迷誌的社會性上，她認為迷誌的社會性可分為內在與外在兩方面（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bility），所謂的內在社會性，指的是組織內牽涉製作、編輯、寫作和流通等事務，在進行這些出版必經的步驟時，迷誌組織內的成員，會強化彼此的熟悉度，最終更將這些事務內化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外在社會性，指的則是透過迷誌建立起來的社群，迷誌社群有一項特色，就是內視（inward-looking）的傾向。也就是說，儘管這些社群成員無法完全忽視外在世界的存在，但是卻是把迷誌當成一個避風港，自我沈溺在一個構築在現實世界之外的社群裡。

至於免費報部分，定義則十分簡單明瞭，凡是讀者獲取不需付出任何代價的就是免費報，按此定義，1996 年後的《村聲》、《破報》與目前台北捷運站可見的《爽報》、《可樂報》都屬此類，《Metro》更是全世界各大都會都可見的免費報，而因為其免費的特性，其讀者群是開放性的，並無法鎖定特定的族群。

最後是另類報，廣義地來說，它是在主流報紙之外的另外選擇，如按此定義，那所有的小眾出版物皆可納入本文討論範圍，不過根據北美另類週報協會（Association of Alternative Newsweeklies）的看法，另類報強調的是有觀點的報導

(point-of-view-reporting)¹，使用強烈、直接的語言，容許個人自由與社會差異，並且報導主流媒體選擇略過的新聞報導。換言之，《破報》、《村聲》或是迷誌都可以被歸類為另類報，然而，不是所有免費的報紙都可以被歸類為另類報紙，像台北市政府發行的《文化快遞》或是紐約的另一份免費報《Time Out New York》，儘管是免費的週報形式，而且內容詳載各項藝文活動（這點與《破報》、《村聲》類似），但是在此定義下，卻不屬於本研究定義的另類報。

儘管同屬另類媒體，《破報》的性質與迷誌又有所不同，迷誌的受眾是要比免費報更為鎖定在特定社群上，免費報如《破報》、《村聲》等，一般將報箱擺設在街道上、捷運站出入口、電影院、校園、pub 和唱片行等地，供讀者自行取閱，對象較不固定，同時內容也涵蓋較廣，包含政治、性別、閱讀、音樂、電影等藝文活動，迷誌的主題卻都十分明確與專精，甚至是針對單一龐克樂團（The Sex Pistols）或影集（星艦迷航記、X 檔案），而且迷誌一般都是透過訂閱與郵寄的管道來流通，自我沈溺與封閉的性格要遠超過免費發送的另類報紙。

2. 另類媒體行動主義

承上所述，《破報》是一份有觀點的免費另類報，除了不同的政治觀點、社運言論等等，《破報》亦關心藝文、休閒等民主實踐的另一層面向，因此從事本研究，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並不足以用來解釋這全貌，因此本文將援引 Hesmondhalgh（2000）的另類媒體行動主義（alternative media activism）的觀念，以補政治經濟學不足之處。馬克思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並不將娛樂等美學層面的民主實踐視為一個嚴肅而值得探討的面向，Hesmondhalgh 則認為，現今民主的實踐是不能忽略美學層面的，如果忽略了，不但是漠視社會現狀，更是忽略了媒體工作者的努力與付出，因此，他提出以 Brecht 和 Benjamin 為濫觴，Kellner 與 Downing 為繼的另類媒體行動主義為解決之道。

Hesmondhalgh 強調，另類媒體行動主義並非否定傳統硬性新聞的重要性，而是美學形式（如娛樂）不應該被以軟性、甚至「劣等」資訊看待，而且另類媒體行動主義透過美學傳達的政治意涵，要比其他形式要強烈得多，而且更重視「媒體產業組織和產品政治美學的關係」（p.109），《破報》經歷一次次的改版，封面故事由社會行動逐漸轉向藝文，也符合這樣的走向，而且多達 19 個版、鉅細靡遺的藝文活動佈告，使得它在致力於另類媒體行動主義的實踐上，成為一個藝文活動訊息的集散中心（hub）。

另類媒體行動主義的精神，既重視媒體產製與配置過程的民主化，也重視產品本身的品質，根據 Hesmondhalgh（p. 121）的論述，文化產業要符合民主的要件，必須包含下列六點：

1) 擴大參與和近用

¹ 見其官方網站 <http://aan.org/alternative/Aan/ViewPage?oid=2086>

- 2) 生產者以合作，而非競爭與科層的控管方式
- 3) 提供富創造力的工作者更公平的獎勵、機會與工作環境
- 4) 地理空間裡的資源與人才能更廣泛地、均衡地配置
- 5) 製造與流動的內容能鼓勵消費者大膽與批判性的參與，也鼓勵他們從事生產
- 6) 高品質、多元化、創新與大膽的內容得以從此類參與中形成

《破報》是否符合上述特質？另外，它是否具有動員社群的能力？這都是探討次文化實踐的關鍵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檢驗。

四、《破報》— 新新聞學與公共新聞學的境界處

如同成露茜、丘德真（2006:187）所述，許多現任《破報》的工作群都是長期閱讀《破報》的社群份子，甚至是多次產製者與讀者角色間的互換，然而，這種「自我實現」的參與，卻未必是一個最有力的媒體產製民主化指標，這樣的互換甚至可能變成一種自我沈溺的傳播迴圈，如此一來，生產者的同質性反而會獲得強化，也就是說，巨觀地從社會層面來說，《破報》是一個另類的、異質的媒體，但是微觀地從內部組織來看，卻是一個同質的組成。

《破報》的風格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它的社群召喚功能是否真如成露茜、丘德真所論述的？它的現存形式是否能與公共新聞學相輔相成？其中的關鍵點就在於此社群的行動力，亦即對於自身認同價值的實踐。《破報》的新聞產製過程是非傳統的、甚至是挑戰新聞作業常規的，記者時常以第一人稱及涉入的剛左（gonzo）手法寫作，事實上與 Tom Wolfe 所倡之新新聞學（New Journalism）才是系出同門。

新新聞學主張以描繪場景取代歷史敘述、強調雙方面的對話、多用第一人稱視角和記錄日常生活的細節，這派的作品由於其風格及隨之而來的篇幅問題，使得其大多出現在雜誌上，Truman Capote、剛左始祖 Hunter S. Thompson、《村聲》創辦人 Norman Mailer 和樂評 Robert Christgau 都是此派代表人物，綜觀新新聞學的作品，像是 Capote 的《冷血告白》（In Cold Blood）、George Plimpton 的《紙獅子》（Paper Lion）、Mailer 的《夜晚大軍》（Armies of the Night）、乃至晚期 H.G. Bissinger 的《週五夜燈光》（Friday Night Lights）等（此類作品也都被稱作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al novel）），這些作品的目的並不在集結社群，甚至沒有任何召喚社群意識的企圖，而僅在於告知，這也就是新新聞學與公共新聞學的最大分野，公共新聞學強調記者與讀者的社群行動力，新新聞學則只在「敘述」。儘管如此，記者的角色在這兩派論述之間是有其共通性的。

根據鍾起惠（2006: 8-9）的論述，新聞學史上歷經四波的改革運動，首先是 1940 年代的社會責任論；第二波即是新新聞學在 1960 年代興起，打著就是突破 1920 年代以降的傳統新聞學教條，主張以小說方式來書寫，強調記者的主觀意

識，甚至是涉入事件本身，這與客觀、簡潔、公正、平衡的新聞金科玉律是大相逕庭的；第三波則是新聞評議會以專業團體的姿態，為新聞學添加更多的信條；最後就是 1980 年代末期的公共新聞學運動。綜觀這四波改革，儘管理論強度上與專業實踐上有所差異，但是其終極意涵都是要將新聞與公眾結合在一起，打破記者為一旁觀第三者的疏離感，其中又以公共新聞學最強調「實踐」這個步驟，藉此公民意識透過新聞媒體得以落實。力主公共新聞學的 Jay Rosen (1999: 262-263) 認為，公共新聞學的五個精神是「立論」(argument)、「實驗」(experiment)、「運動」(movement)、「辯論」(debate) 及「冒險」(adventure)，根據上述五點來檢驗《破報》在公共新聞學上這條光譜上應置於何處，當是探討該媒體是否能負起「實踐」與「建構」的先決問題。

首先在「立論」部分，公共新聞學提供一個新聞媒體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且有下列四點功能：1) 把人們當成公民，也就是潛在的參與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觀者；2) 幫助政治社群解決問題，而非只是瞭解問題；3) 改善民意氣候，而非冷眼旁觀其惡化；4) 協助改善公共生活。「實驗」部分，指的就是公共新聞學挑戰傳統新聞價值的嘗試。「運動」方面，公共新聞學是一個結合線上記者、學者、及其他有志於改革的一個運動網絡。它當然也是一種「辯論」，不但提供公民辯論的空間，就連媒體組織在公共新聞學中的角色定位，也是可供議論的。最後，公共新聞學是一種沒有成規、沒有一定成功模式、與其他公民網絡之間是沒有界線的浪漫「冒險」，Rosen 本人也說道，在這場冒險中會發現什麼，他也無法預知。

《破報》鮮明的批判色彩與左傾的立場，在長期缺乏左派聲音的台灣媒體中，「立論」絕對十分清晰而且鏗鏘有力，近年來甚至是對曾經支持的活動（如春吶）變質而加以撻伐²，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也對民意氣候的形成與公共生活有正面的影響；「實驗」部分，《破報》與傳統報業的運作，可說是天差地別，甚至是要顛覆「大眾傳播媒體內部的新聞專業本身」，加上獨特的新聞室文化，《破報》的實驗色彩也無庸置疑。至於「運動」、「辯論」和「冒險」部分，則需要進一步分析。

根據 Rosen 對於公共新聞學「運動」精神的定義，強調的是一個志同道合的社群網絡，《破報》在這方面可說是十分投入，對於寶藏巖、樂生療養院的保存運動歷程中，色彩鮮明，毫不隱諱地痛陳立場，2006 年 7 月 14 日出刊的《破報》，其中一篇名為〈記者手記：台北縣政府，我差點以為是坨屎〉，直接與情緒性的用詞，令人側目；同月 28 日的《破報》封面故事，則是以「最後的生存戰！——樂生院前進國民黨」為題，報導維護樂生院的抗爭活動，進而鼓吹〈反對迫遷樂生院 放下論文上街頭〉，《破報》在這過程中，所串連的已不只是對於新聞不滿的社群，更是集結社群、發起社會運動的哨兵。而且此網絡已經不侷限在台灣本地而已，在網路版的破報「樂生院」區塊中，邀集國際人士連署為樂生請命³。2007 年 4 月 28、29 日主辦「媒體行動者與直接行動」的 DIY 工作坊，邀集日本、

² 總編輯黃孫權曾為變質的春吶寫下「墓誌銘」，見 <http://iwebs.url.com.tw/main/html/epots/65.shtml>

³ 見 <http://pots.tw/node/1270>

韓國、香港以及台灣本地的媒體行動組織交流，該活動還特別強調是一場實踐層面，而非僅是學術清談式的交流。

「辯論」方面，根據成露茜、丘德貞（2006：182）的研究，《破報》曾經為了一篇轉載的同志議題文章〈同性戀捲旋風：意識形態 西來宰制〉，導致讀者批評作者趙萬來，並將論戰戰線延續到《破報》的母報《立報》上，成、丘則將此現象解讀為《破報》社群的期待、不同聲音的表現，也是公共新聞學「辯論」精神的展現；另外，針對今年的「轉型正義」演唱會，三月份的《破報》就分別出現正反兩面的文章，首先是復刊 449 期裡〈Freddy 的搖滾教室—「正義無敵音樂會」〉和〈商業演唱會搞轉型正義，正義真無敵！〉就嚴詞批判了假正義之名行商業之實的聲音，不過在三週後，則刊出了該活動主辦人 Freddy 的專訪，讓他澄清外界對於「轉型正義」演唱會的疑慮。印刷媒體如此，《破報》網站所採取的開放碼，更方便其社群成員在文章上發表意見與辯論，上面更不時可見充滿火藥味的你來我往⁴，儘管大多數文章的回應數量有限，但是這樣的平台的確是充滿著辯論的潛力。

《破報》對於議題的獨到洞察力，也有絕對的「冒險」精神，像是最近樂生療養院的議題、較早的反反毒系列、墮胎、乃至長期關注的同志議題等，都在其變成主流議題前，就獲得《破報》的持續著墨，而且其論點更是對保守勢力的當頭棒喝，稱「冒險」為《破報》的標竿精神之一，絕對不為過。

然而，如果根據上述，論者就貿然認定《破報》超越了新新聞學的敘述與告知，而具有召喚公民意識，建構社群的功能，進而奉為公共新聞學的實踐者，那可就是過於浪漫地驟下結論了。首先，《破報》「社群」究竟存在與否，就是一個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成露茜、丘德貞（2006）樂觀地認為，《破報》「挑戰、顛覆或逃逸主流媒體，去集結一個未成形的社群（prefigurative community）」（p.174），不過既然是一個「未成形」的社群，最終成形與否或是現在是否具有成形的跡象，便成了關鍵問題。

簡單地說，一個社群必須資訊共享、意見討論、共識凝聚乃至行動展現（Rheingold, 2000），《破報》報導範圍廣泛，藝文活動訊息包羅萬象，光是音樂部分就包含搖滾、電子、實驗、爵士、老歌、古典、傳統戲曲等，頭版大辣辣地放著聯想筆記型電腦的廣告、裡頭卻談著當代藝術的自由冒險（復刊第 460 號），整份《破報》就像是個炫麗的後現代拼貼，後現代門面、左派骨子，就是這樣奇特的組合，這樣的組合下，資訊是被共享了、意見某種程度上被討論了、部分共識凝聚了，我卻仍對《破報》與行動展現間的關係存有疑慮。這樣的疑慮倒不是對於《破報》的言論有所質疑，而是對於本研究目前進度，不得不採的審慎態度。

《村聲》週報一直扮演著反戰運動的推手，從六、七零年代反越戰到九零年代反波灣戰爭，《村聲》不但未曾缺席，更在其中扮演大力鼓吹民眾參與反戰遊行，最近一波反布希增兵的遊行，《村聲》號召民眾參與，而且將活動的內容、甚至是如何參與（包括交通路線、住宿地點、該攜帶的物品等等）都鉅細靡遺地

⁴ 見〈寶藏巖公社連意識型態也不是〉<http://pots.tw/node/383>

刊載⁵，但即便如此，《村聲》與反戰行動間的關連仍無法獲得直接的證明。同樣地，雖然《破報》與近來捍衛寶藏巖、樂生院的行動「看似」有所關連，然而，缺乏進一步實證資料的情況下，這個部分只好暫時採取比較保留的態度，待本研究下一階段，進入田野與焦點團體的資料蒐集部分。

五、結論與展望

受限於本研究的時間，無法進行實踐層面的研究，以及更進一步對於《破報》新聞室文化與其讀者群的關係進行第一手的資料蒐集，由於《破報》屬於免費報，放在公共場合供人取閱，對於讀者群的掌握度有先天的難度，儘管成、丘（2006）文中提及，《破報》透過讀者自發性回饋，也可以掌握到它的讀者群，但這到底還是只能掌握到較主動的讀者，整體讀者/社群的側寫仍是模糊的圖像。

公共新聞學、新新聞學的部分特質都可以在《村聲》與《破報》兩報中找到，一方面藉由主觀的敘事手法喚起公民對特定議題的關注，同時也企圖召喚公民投入社會運動的行列，不過由於兩者都是內容包羅萬象的免費週報，也正因此很難對於它們進行單一理想型的定位，這與迷誌社群是非常不同的，迷誌的社群同質性高、流通對象固定、文章主題也較專精，免費的另類報刊載的藝文訊息與樂評、影評和劇評，都是另類媒體行動主義所強調的美學實踐層面，加上與公共新聞學精神的契合，令人不禁對於《破報》這樣的另類媒介充滿浪漫的幻想與期待。

不過，如同 Gans（2003）提醒我們的，若要將訊息的傳播和民主實踐劃上等號，是一項太天真的想法，傳播與行動的構連，要遠比字面上要困難的多，新型態的群體社會運動，儘管是一種結合公共訴求與公民行為的混合式社會行動（blended social action），但是組織的動員還是比傳統人際關係要有力的多（Sampson et al., 2005），因此，就以捍衛樂生院的行動來說，《破報》與青年樂生聯盟等其他相關團體間的關係，是值得更進一步研究的，換言之，「訊息」轉換成「行動」的過程，才是本研究的最終目標，藉此，《破報》社群在都會次文化實踐的過程（如果它真具有社群的特質），也會得到進一步的釐清，這也是本研究關鍵性的一步。參與和實踐與否便是社群與讀者群最大的差別所在，透過蒐集的第一手實證資料分析後，方能對於本研究主題「另類媒體與社群建構－《破報》與台灣都會次文化的實踐」有全方位的認識。

⁵ 見 <http://www.villagevoice.com/news/0704,ferguson,75614,2.html>

參考文獻：

一、英文部分

- Atton, C. (2002). *Alternative Media*.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Enzensberger, H. M. (1976). *Raids and Reconstructions : Essays on Politics, Crime, and Culture*. London: Pluto Press.
- Enzensberger, H. M., & Roloff, M. (1974). *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on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Media*.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Fiske, J. (1991).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Gans, H. J. (2003). *Democracy and the New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 Radway, J. (1999, 15-18 July). *On the Importance of Readers and Reading: Points of Origin in Book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ety for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Authorship, Reading and Publishing's Annual Conference, Madison, Wisconsin.
- Rheingold, H. (2000). *The Virtual Community :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v. , 1st MIT Press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Rosen, J. (1999). *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utherford, P. (1992). *Fanzine Culture*. Glasgow: Flower Pot Press.
- Sampson, R. J., McAdam, D., MacIndoe, H., & Weffer-Elizondo, S. (2005). Civil Society Reconsidered: The Durable Nature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Civ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3), 673-714.
- Savage, J. (1991). *England's Dreaming: Sex Pistols and Punk Rock*. London: Faber & Faber.
- Triggs, T. (1995). Alphabet Soup: Reading British Fanzines. *Visible Language*, 29(1), 72-87.
- Zobel, C. (1999). Zines in Public Libraries. *Counterpoise*, 3(2), 5-10.

二、中文部分

- 成露茜、丘德貞（2006）「逃逸主流、獨樹一格—台灣另類『破報』群像」，鍾起惠主編 世新五十學術專書—公民的新聞與社群想像。台北：世新大學。
- 鍾起惠（2006）「當代新聞角色再思考：重返新聞與公眾的國度」，鍾起惠主編 世新五十學術專書—公民的新聞與社群想像。台北：世新大學。